

中国古代最高统治者的称谓与东亚国际秩序

金永镇(国民大学)

1. 绪论

语言是维持社会秩序所不可缺少的象征体系。尤其在政治上，语言的象征在反映权力关系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权力关系不仅存在于一国之内，也存在于国与国之间。在东亚地区从早期历史时期就开始共享汉字这一语言文字体系，形成了一种国际政治秩序。因此，在东亚地区语言的象征意义很早就开始反映国家之间的秩序。

在语言的多种象征意义中，统治者的称谓在政治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专制政治体制下各国政治被最高统治者垄断，而垄断者拥有区别于其他统治者的称谓，而且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基本由各个统治者为代表，因此国家之间的等级秩序也就能够体现在各个统治者的称谓上。

在东亚国际秩序形成时期，中国经过长久的历史进程建构了一定的政治体系，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也创建了包括最高统治者称谓的语言的象征体系。在早期国家形态中，这一体系具有不确定的一面，但至少从公元前十七世纪建立的商朝起，经过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再经秦、汉等国家一统时期，最高统治者的称谓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并且这种历史经验也在西汉后期也就是东亚国际秩序形成过程中成为中国与邻国之间形成象征体系的重要前提。中国早期历史上最高统治者的称谓与他的权力有着紧密的关系。而与这种情况类似，在东亚国际秩序形成过程中，各国也曾围绕最高统治者的称谓问题展开相当激烈的角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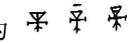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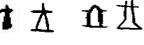
就这些问题及认识，本文将分两大部分进行阐述。本文将在第二节中探讨早期中国最高统治者称谓的历史变迁。将结合帝、天子、王、霸、疆（强）、皇帝等称谓的出现背景来深入分析探讨这些称谓的政治意义。本文还将把重点放在“皇帝”这一称谓的出现过程上，因为皇帝是中原大国乃至整个东亚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本文在第三节中将考察东亚各个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谓，并将着重探讨韩中日三国之间在古代国家形成过程中围绕称谓存在过的矛盾与纠结。第四节结论部分将综合本文内容，总结说明称谓的政治意义。

2. 中国早期历史上最高统治者称谓的历史演变

2.1 “帝”与“王”的出现

在中国历史上，“帝”是最高统治者最初的称谓。《史记》和《竹书纪年》等史书都将始祖黄帝至夏朝末期的统治者记载为“帝”，而之后的情况，记载有所不同，如对商朝的统治者《竹书纪年》直呼

其名，统称为“王”，而在《史记》中仍称这些统治者为“帝”。进入周朝以后，对这些统治者，两本文献都使用了“王”这一称号。

其实 商的最高统治是否自称为“帝”，这一点尚不明确。¹ 史书是后代记录的，并不一定记录了当时的称呼与概念。商朝曾信奉“帝”为万物之主。甲骨文中“帝”为 ，据说这一形象是支起树枝燃火，向天祭祀的形象。而在商国文字甲骨文中，王为  等形象，据说这是斧钊朝下的形状，这一象形被解释为象征统治者主管刑罚，具有统治者的权威，² 但这些都只在反映一种原始的力量，而不具有后世所赋予的那类似于天命的超越性意味。

而周朝推翻了商朝之后，不仅替代“帝”之概念，信“天”为守护神，同时将“王”与天子联系在一起，即立足于天命观念，主张其统治的正当性。³ 但周朝天子虽被看作拥有普天之下最高统治权，但在封建社会分权制度下，他所能行驶的实际权力应该是有限的。总之，进入周朝，最高统治者的称谓一般定位在“王”这一称谓上。春秋时期天子也被称为“王”，其它诸侯使用公、侯、伯、子等爵位。⁴

进入周朝以后，“帝”这一称谓虽然没有被用来称呼现世的最高统治者，但“帝”也没有完全消失，这一概念位居天与人之间。有学者说，它具有一种“始祖神”的地位，因此，帝喾、尧、舜等上古时代统治者都被称为“帝”。⁵ “帝”的这种逐步人格化的定位，为后世以它来称呼现世统治者留下了很大的余地。

2.2 “霸”的出现

春秋时期，各诸侯仍将周王为共同的君主（天下共主），并以“王”来称呼天子，只有远离中原的吴、楚却不承认这一事实而自称为王。其他诸侯国的统治者都使用公、侯等爵位。当然，春秋时期周王朝的势力已严重削弱，随之也出现了行使大权的强有力的诸侯。这一诸侯称之为“霸”，“霸”虽然依据强力出现，但他（它）被视为诸侯之长，是支配天下的一个实体。而最高统治者“王”却变成一个形式上的权威人物，“王”与“霸”之间只存在名分上的上下级关系。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战国初期。

而进入战国时期，“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称谓，其权威更为削弱。各大强国竞相争霸，致使以特定“霸”主为中心的、尊王攘夷的社会秩序也都难以维持。进入战国中期，各国在竞争过程中相继拥有

¹ 据东汉末期文人蔡邕记载，伏羲氏，神农氏为皇，尧舜为帝，夏·商(殷)·周皆称王。【汉】蔡邕，《独断》卷上，《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十，850-76。

² 叙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p. 7，p. 32。

³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pp. 70-82。

⁴ 当然，也有将春秋时期周王看作“帝”的认识。“周礼未改 今之王 古之帝也”，（《春秋左传》 僖公 25 年(635 年)）

⁵ 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与东亚世界（中國古代國家と東アツア世界）》，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83，p. 56。

了“王”的称号。在理论上，“王”仍比“霸”居上。商鞅（公元前？——338年）的《商君书》中以“王”代表完美的统治者，而未用“帝”这一称谓，以“霸”或“疆”（或“强”）当做现实中强有力的国家形式，并作为可追求的目标表达了出来。

故三王以义亲，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乐其政，而莫之能伤也。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⁶

商鞅之后，大约到他下一代时，在儒家孟子（公元前约372-289），“王”与“霸”的概念出现了更大的区别。孟子将两者区分为道德政治和权力政治，他推崇前者，而对后者进行了批判。在孟子看来，依赖“王”的道德政治，即王道政治才是最为理想的政治。如，孟子曾做如下阐述。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⁷

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⁸

较之孟子，荀子（约公元前313-238）可谓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对荀子来说，“王”依然是代表最高的统治秩序。荀子将“王者”视为天下秩序的最高形态，而霸者次之，⁹他将两者放在“义”与“信”的原则基础之上。¹⁰把王者视为仁义的象征，以汤王与武王为王道统治的代表人物；把霸者视为权力统治的象征，以春秋时期齐桓公等五霸为代表人物。《荀子》中将王者和霸者相提并论的情形多达数十次。如“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¹¹，另有“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权谋立而亡”¹²。

但是，到韩非子（约公元前280-233），这位从师荀子，并构建法家思想体系的人物，在他这里“霸”与“王”的区别变得模糊。他将两者结合起来，使用了“霸王”这一概念，实际上两者别无二致。他尤其强调法制的重要性。

⁶ 《商君书·修权》。

⁷ 《孟子·公孙丑上》。

⁸ 《孟子·尽心章句上》。

⁹ 《荀子·君道》。

¹⁰ 《荀子·王霸》。

¹¹ 《荀子·王制》。

¹² 《荀子·疆國》。

伊尹得之，汤以王；管仲得之，齐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强。此三人者，皆明于霸王之术，察于治强之数，而不以牵於世俗之言；适当世明主之意，则有直任布衣之士，立为卿相之处；处位治国，则有尊主广地之实；此之谓足贵之臣。汤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为天子；桓公得管仲，立为五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广，兵以强。¹³

殷朝的汤既是王也是天子，齐桓公是所谓的春秋五霸之一，秦孝公富国强民，为统一六国、建立帝国奠定了基础。对韩非子来说，这三位人物的等级秩序是模糊的，但明确的是至少他们在当时都在行使最高的权力。

2.3 “帝”的重新出现

战国末期，在进行统一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欲将自己区别于其他诸侯的企图。这个国家也就是秦国。公元 288 年昭襄王时期，秦国向齐湣王提议一同称帝。当时齐国，已由威王（公元前 355-320 在位）两次击退魏国军队，经宣王和湣王时期，正与秦国东西对峙，维持一种两强体制。在这种情形下，秦国提议称秦为西帝，称齐为东帝。这是因为如果秦国自己称帝，就会遭到各方诸侯的反对，另一方面这也是依据远交近攻的战略，与齐国建立同盟关系，以来攻略赵国等周边国家。但从齐国看来，称帝只会提高秦国的地位及形象，而此时如果拒绝秦国的提议，反而能够确保自身的道德性。于是，齐湣王接受苏秦的想法，没有接受昭襄王的提议。¹⁴

而在此时，称帝的历史意义并未清晰浮现，但是可以说称帝在当时封建制度下，开始逐步获得与天子之位有所不同的意味。于此相关，齐国名士鲁仲连曾直接谈论此事，当时魏国正在被秦国要求一同称帝。他曾对魏国大臣辛垣衍强调秦国称帝的负面作用。他指出，帝之位不仅本身具有绝对的权威，而且秦国会依靠自己的国力来行驶这一强大的权力，会像过去商朝最后一个天子纣那样滥用这种权利。如果秦国受诸侯支持登上“帝”的地位，它会通过任命官吏，提供妻妾等方式，随意削弱诸侯的权利。¹⁵ 在鲁仲连眼里，“帝”与“王”是不同的，“帝”是具有中央集权及专制统治意味的一种概念。

无论如何，战国末期，“帝”登上了政治思想的历史舞台。《荀子》中将“帝”作为天下最高统治者来记录，该例出现一次。¹⁶ 而这一概念在《庄子》中出现了 11 次之多。¹⁷ 在《庄子》中单独用“帝”

¹³ 《韩非子·奸劫弑臣》。

¹⁴ 估计齐王当时判断，在类似情况下，攻打赵国，还不如攻打宋国，因为宋国当时经常挑衅邻国而恶名远扬。《春秋左传》 赧王 27 年(公元前 288 年)；《战国策·齐策 4》。

¹⁵ 《战国策·赵策 3》；《史记·鲁中连邹阳列传》。

¹⁶ 《荀子·王霸》。

¹⁷ “帝王”集中出现在《天道》篇中(出现七次)，《天地》、《天运》、《秋水》、《让王》等各出现一次。

用来称呼统治者的情况有一例，这是引用老子的话时出现的，即为“调而应之，德也；偶而应之，道也。帝之所兴，王之所起也”。¹⁸

而在这一时期，“帝”与“王”结合在一起的情况较多，如上面引文中“帝”与“王”虽然分别出现，但两者等级地位的区别是不明确的。但是到韩非子时，“帝”或者“帝王”的意义就变得清晰起来。

夫婴儿相与戏也，以尘为饭，以塗为羹，以木为馘，然至日晚必归饕者，尘饭塗羹可以戏而不可食也。夫称上古之传颂，辩而不惑，道先王仁义而不能正国者，此亦可以戏而不可以为治也。夫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也；不慕而治强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毕也。¹⁹

在韩非子看来，“帝”区别于仁义，“帝”是建立在法与术之上的。在韩非子眼里，秦虽然具有强大的权力资源，但它仍无法称帝，这是因为秦还没有建立完善的法制体系，还无法正确使用术数。²⁰他认为，帝与帝王是在现实中被推崇的最高统治者，但在理论上，他没有对“帝”、“王”、“霸”等概念进行等级问题的探讨。他也仍在使用“霸王”概念来描述天下统一。²¹这说明在战国后期“帝”这一概念中包含“霸”的各种要素。

另外，《管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等文献中，频繁出现帝—王—霸这种等级秩序。²²在道家文献《文子》，以及兵法书《吴子》中，虽然这些文献成书年代不详，但都出现一次有关帝王的综合性概念以及帝—王—霸的等级秩序。²³在周国史书《逸周书》中，作为一种变型，是以帝—天王—天子—君—侯等顺序进行排序的。²⁴可见，战国末期，帝—王—霸这种等级排序已经比较普遍。随之，“帝”这一概念便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2.4 秦的统一与称帝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了天下，而后马上就在朝廷商榷最高统治者称谓问题。这主要是基于一种认识，即认为自身地位与以往其他国王相比有着质的不同。《史记》详细介绍了这一过程。

¹⁸ 《庄子·知北游》。

¹⁹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²⁰ 《韩非子·定法》。

²¹ 在《韩非子》全文中，霸王这一概念至少要出现 24 次。本文参考的是中国哲学电子化计划网站上的版本。

²² 《战国策·燕策 1》。

²³ 帝者有名，莫知其情，帝者贵其德，王者尚其义，霸者迫于理。（《文子·自然》）；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吴子·图国》）

²⁴ 侯能成群，谓之君。君有广德，分任诸侯而敦信，曰予一人。善至于四海，曰天子。達于四荒，曰天王。四荒至，莫有怨訾，乃登为帝。（《逸周书·太子晋解》）

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25

可见，他已经决定使用“帝”这一称号。也许这是因为早在 67 年前他就曾想使用“帝”这一称号，而这种想法依然有效，或说明当时“帝”这一概念已经被普遍看作是“王”的上位概念。²⁶ 不管怎样，对于他的要求大臣们都异口同声表示赞同，并强调秦始皇的业绩大大超过五帝。

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²⁷

大臣们还与博士们进行商讨，之后，奏请秦王使用古代最为尊贵的称号“泰皇”。但秦始皇并未完全接受大臣们的意见，他去掉了“泰”字，只留取了上古时代最高统治者“帝”号，要求称自己为“皇帝”。

《史记》未对皇帝这一概念做出明确的说明。因此，研究者们对这一词有两种不同的解释。首先，认为这一词取自中国上古历史中出现的三皇五帝。例如，《资治通鉴》等文献记载，秦王认为自己平定了天下，“德比三皇，功过五帝”所以称自己为“皇帝”。²⁸ 另外一种解释认为，“皇帝”这一称谓取自具有“辉煌”、“伟大”之义的“皇”，与带有主宰天下的神之义的“帝”字相结合而成。²⁹ 《论语》中作为“伟大的上帝”之义，曾出现过“皇皇后帝”的说法。³⁰ 无论如何，战国时期，秦国使用“帝”这一称号已非新鲜之事。明确的是这一称谓属于最高级称谓，其地位远高于以往国王的称谓。

2.5 汉代以后“帝”与“王”

秦朝命短，汉朝建立之后，刘邦继承了秦朝的政治制度以及皇帝称号，同时还恢复了一部分封建制度，册封了诸侯，并赐予“王”的称号。这样，“王”就成为一种爵位，地位降低了。秦汉时期，皇帝

²⁵ 《史记卷·秦始皇本纪》。

²⁶ 雷海宗，“帝王制度之成立”，《清华学报》，1934年9卷4期，pp. 860-861。

²⁷ 《史记·秦始皇本纪》。

²⁸ 《资治通鉴》卷2；【汉】蔡邕，《独断》卷上，《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十，850-76。

²⁹ 西嶋定生，“中国古代统一国家的特质 - 皇帝统治之出现”，杜正胜编，《中国上古史论文选集(下)》，台北：华世出版社，1978，pp. 732-733；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11，pp. 2-3。

³⁰ 《论语·堯曰》。

这一称谓与天子一样被普遍使用。正如上文谈到的那样，天子这一称谓在殷周时期就已被使用，其概念含有依赖天命行使正当统治权的意味。

这些历史经验也都如实反映在后世的政治话语中，也就是说，经过战国时期被有序排列的帝—王—霸这一等级概念在后来的政治话语中不断出现。进入汉朝以后，“帝”作为最高统治者一直居“王”之上，³¹如西汉初期的由陆贾、贾谊所撰写的代表性文献《淮南子》中就有相关记录。《淮南子》中记载：

帝者，体太一；王者，法阴阳；霸者，则四时；君者，用六律……帝者体阴阳则侵，王者法四时则削，霸者节六律则辱，君者失准绳则废。³²

“帝”虽然在概念上居于“王”之上，但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王者及其变形——“霸王”、“帝王”等也依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称谓被广泛使用。尤其是进入汉代以后随着儒家思想的逐步确立，“王”作为理想化的统治者与王道这一“王”的统治原理一同被广泛使用，它们要比帝或“帝道”更为频繁出现。其结果，汉朝以后，“王”这一称号至少在理论层次上巩固了它作为最高、最理想的统治者的形象。陆贾的《新语》中虽没有过多谈论最高统治者，但也频繁使用了王、王者、圣王、帝王等概念，其使用频度远高于“帝”之概念。贾谊作为其后的人物，他在《新书》中，也将王道、王者、王天下等概念作为最高统治者或其统治原理来多次使用，其例约有数百例。而“帝”只有在涉及五帝等固有名词或指称汉朝皇帝时作为一种缩略语来使用，在统治原理上，“帝”只出现过三四次。归在杂家类的文献《淮南子》中，多次出现王、王道、帝王等概念，霸王一词也多次出现，但“帝”是作为超越于“王”的，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集权利于一身的强大的统治者形象出现的。

3. 古代东亚社会秩序的形成与统治者的称谓

3.1 古代国家的形成与称王

中国皇帝是与统一的国家一同登场的，那么周围其他民族的情况如何呢？尤其是中国与古代韩国、日本等国家之间建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公元二世纪初写成的《史记》记载了当时位于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北部的朝鲜国的情况，对于古朝鲜周边和朝鲜半岛南部以及日本的情况没有留下记录。而这并不意味该地区无人居住或无政治组织存在，应该说该地区当时尚处在国家形成之前的发展阶段，尚未与汉朝建立国际关系，这些国家与汉朝的关系是在东汉后期逐步变得清晰起来的，尤其是在中国南北朝

³¹ 张贤根，《圣王：东方领导力的原型》，首尔：民音社，2012，p. 119。

³² 《淮南子·本经训》。

时期、隋唐时期，这些国家发展为具有统一国家形态的政治组织，他们与中国展开了复杂的国际政治活动。

(古)朝鮮

在古代东亚政治共同体中，首先进入汉朝政治秩序的是朝鲜。³³ 最初被世人所知的朝鲜最高统治者带着“侯”这一春秋时期诸侯的爵位登场的。这是因为朝鲜被看作是周武王所封的箕子的后裔。战国时期中原国家都在使用“王”这一称号，准（朝鲜王）也“僭称”为王，当时与朝鲜相邻的国家燕国也在公元前 323 年称王，两国称王的时期相近。³⁴

据传，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中国之后，朝鲜王否曾派使臣前往秦始皇帝那里。当时朝鲜已被燕国将军秦开夺去了西部两千里国土，朝鲜担心秦国也来攻击，于是决定臣属于秦国，但是朝鲜王拒绝亲自拜见秦王。汉朝建国以后，诸侯燕国的卫满从否的儿子准那里夺取了王位。他自称为王，然后他与辽东郡太守商定，成为汉朝的外臣，并被承认为朝鲜的国王。但是在他的孙子右渠执政时期，汉武帝灭了朝鲜，并将其编入汉朝的郡县。

夫余和高句骊（丽）

夫余是一朝鲜之后出现在历史舞台的国家，韩国史上的主要古代国家高句丽和百济等将自己称作夫余的一个支派。百济王族称自己为夫余氏，还将国号称为南夫余。高句丽的建国神话中提到夫余一派南下建立了高句丽。

夫余国的形成过程鲜为人知。《史记》中有一处记载，诸侯国燕北上与乌桓一道，和夫余进行了经济交流。³⁵ 《汉书》中记载，夫余尤其在西汉王莽时期与高句丽、濊貊等其他东夷势力一起成为汉朝国防上的不安定要素。可见，夫余在秦、汉初期，即公元三世纪开始就已经存在，并具有王的称号。³⁶

五个部落的联合体高句丽，其各部落头人称为大加，联盟体的盟主称王。比夫余稍晚建国的高句丽，中国文献没有对它的形成过程留下记录，而相关内容出现在《三国史记》中。据该文献记载，高句丽始祖朱蒙，即东明圣王在公元前 37 年从夫余南下至鸭绿江中游地区建立了这个国家。而到西汉末期，高句丽和夫余作为王国从汉朝接受了印绶。高句丽曾在琉璃王 33 年，即公元 14 年在王莽执政初期，袭

³³ 历史学家将这一时期的朝鲜称为古朝鲜，为的是与后来的李家王朝朝鲜相区别。

³⁴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李基白、李基东，《韩国史讲座》（古代篇），首尔：一潮阁，1982，p. 58。

³⁵ 《史记·货殖列传》。

³⁶ （韩）国史编纂委员会，《韩国史 4：初期国家 古朝鲜·夫余·三韩》，2003，p. 63。

击并夺取了玄菟郡的高句丽县。³⁷ 但是王莽建立“新”之后，为了将邻国的王位降低为“侯”，曾派使臣来更换了汉朝的印绶，其中也包括高句丽和夫余。³⁸

到东汉初期，夫余和高句丽派使臣进行协商，恢复了他们王的称号，并与汉朝建立了朝贡册封关系。《后汉书》中记载，夫余王和高句丽频繁派使臣以礼进献，同时也记录了侵略边境等敌对行为。

百济与新罗

当时在朝鲜半岛南部，有数十个部落以马韩、辰韩、弁韩等三韩联合体形式存在，尚未形成中央集权制国家。中国文献对存在于朝鲜半岛北部，当时以比较发达的政治组织登场的乐浪郡等有不少记载。如《后汉书·东夷传》、《三国志·东夷传》等文献都记载了依据政治组织的势力分别赐予王、侯、邑君、邑长等称号的事例。³⁹

而三韩的各个小国后来发展为新罗、百济等古代国家，这是它这几个世纪以后的事情。据传，马韩的最高头领称为目支国王，附属于百济的各个小国分别称为臣智、邑借等。后来，百济成为马韩的中心国家，掌握了汉江流域，并使用王号，但确切年代不详。在 2009 年发现的百济武王碑文，弥勒寺金制舍利奉安记中写有大王陛下这一称号。学界推测，这是在公元 538 年建都泗沘城时称王的。而《南齐书》中载有一篇文章，这是百济盖鹵王（？-475 年）先向一些贵族赐予了王或侯的爵位，事后才奏请皇帝印绶的文章。⁴⁰

在新罗使用了居西干、次次雄、尼师今、麻立干等称谓。据传，王号最初是在第 22 代智证王 4 年（公元 503 年）起开始使用的。⁴¹

倭（日本）

日本地区在古代称为倭。《史记》中没有关于倭的记录。倭在《汉书》中有记载，这说明倭基本是在武帝时期以后与汉接触的。《汉书》外国传中没有相关记录，仅在《汉书·地理志》中有关朝鲜的记录中简短地谈到了倭。如“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⁴² 倭在《后汉书·东夷传》中有着较为详细的记录。⁴³

³⁷ 《三国史记》卷 13《高句丽本纪》一。

³⁸ 《汉书·王莽传》。

³⁹ 《后汉书·东夷传》；《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金翰奎，《韩中关系史》，首尔：阿勒可（音译），1999，pp. 128-129。

⁴⁰ 《南齐书·蛮夷列传》。

⁴¹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四。

⁴² 《汉书·地理志》。

《后汉书》中还记载，在光武帝（公元 57 年）与安帝（公元 107 年）时期，倭曾两次派使臣来进献。尤其在光武帝时皇帝见“倭奴国”前来朝贡进献，就赐给使节印绶。⁴³ 这些记录也说明，汉代时，日本地区也曾像三韩那样有着不少小国存在。

日本在当时分为多个小国的情况下，其中一些国家从公元 3 世纪开始就向中国盟誓效忠，这是为了在国内统一战争中确保自身优势，以便更有力地对付敌对势力。⁴⁵ 如三国时期，倭的女王卑弥呼曾在公元 238 年派遣使臣前往魏国，魏皇帝召见时称她为“制诏亲魏倭王卑弥呼！”，并转达了诏书，这似乎是将倭看作臣属于魏国的外臣，其内容为：“汝所在踰远，乃遣使贡献，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⁴⁶。

女王在之后公元 240 年到 247 年之间曾 4 次派遣使臣前往魏国，以保持两国关系。这种关系持续到西晋（265-316），而之后二百年间两国关系断绝。倭在五世纪以后，又重新与南朝各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3.2 皇帝—王—天皇

古代东亚国际秩序的特点是以大国，即中国为中心，其周围形成了一些小国，国与国之间存在不少权利的非对称性。中国皇帝的统治范围覆盖全国，同时覆盖周边其他国家。皇帝即便实际上只在统治中国，但其权威和影响力被视为遍布天下。可以说皇帝这一名称，正如其名是支配天下的统治者，因而他不仅仅只是一个特定国家的统治者。在近代以前帝国之概念未曾被使用过，应该也是因着这种缘由。

中国皇帝试图以册封方式，在他与臣属的国王、贵族之间建立起君臣关系，并将其制度化。关于此，汉代就已经制定了相当严格的制度。印绶原是在中国国内印证国王或皇帝管理的官印，后来它也授之于周边其他民族的头领。

印绶是以印章之印以及印章手把上系着的丝带--绶，结合而成的词语。印绶按照官职与爵位，上面所刻的文字、手把款式、色彩等都有所不同。赐予国内诸侯的，即赐予内臣的印章上一般刻有“○○王

⁴³ 《后汉书·东夷传》。

⁴⁴ 《后汉书·光武帝纪》，《后汉书·安帝纪》。

⁴⁵ Wang Zhengping, “2 Speaking with a forked tongue: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238-608 A.D.,” Caroline Rose (ed.), *Sino-Japanese Relations Vol 1: History,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11, p. 35.

⁴⁶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

(之)玺”的字样，授予外臣的印章上一般刻有“汉○○王(之)章（或印）”等。而授予日本的印绶上写有“汉委奴国王玺”，多了一个“国”字，这也被解释为当时日本位居外臣之外。⁴⁷

当然，之后这种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以非常精致的形态出现。但这也导致出现过于注重形式，而脱离实际的情况。如有文献记载南北朝时期周围邻国与南朝建立朝贡册封关系的记录。如，宋武帝（420-422年在位）曾封高句丽王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营州诸军事、征大东将军、高句丽王、乐浪公等，曾册封百济王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百济王等称号。宋文帝（424-453年在位）曾册封倭王为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可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倭国王等。⁴⁸

而该记录也成为日本主张他们曾管辖古代朝鲜半岛一部分领土的依据。但是围绕称谓中包含的对于一些地区与国家的管辖权问题仍存在很大争议，因为这不能单以字面意义来理解。⁴⁹ 管辖权很可能只是一种期待，而不是事实本身。因为称谓一般不是皇帝给定的，是朝贡国向皇帝请示而定的。如上面提到的那样，宋武帝赐予倭王的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可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等都是自我称谓，而这些称谓后来都被纠正。

但围绕日本最高统治者曾经称帝的事情目前还有争议。《日本书纪》记载了钦明天皇十二年，也就是公元 552 年百济的圣明王曾将佛教传于日本的事情。百济王将佛像和经书等送予日本，并附上一纸表文，其中有如下内容：“百济王臣明 谨遣陪臣怒唎斯致契 奉传帝国 流通畿内 果佛所記我法东流”，⁵⁰ 这一内容存在两方面问题，其一为文中出现的“帝”是用来称呼日本最高统治者的，其二文章称呼日本为帝国。

事实上帝国意味着“皇帝的国家”，而只有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才可称帝，其他国家是不可以随意使用这一称谓的。实际上帝国的概念在近代以前几乎没有出现过。不管怎样，文章中是百济称日本为帝国的，这一点，有时也被解释为日本比百济位居更高的地位。在当时日本自称“帝”的情况下，“帝国”也许只是一种外交辞令而已。这是因为“帝国”作为皇帝的国家，它已经被视为“上国”的概念，并广为使用。⁵¹ 应予以关注的是，《日本书纪》是一本成书于公元 720 年的史书，它在极力合理化或美化天皇登上历史舞台。书中所使用的词语很可能是用来体现这种撰写目的的。除以上这些记录之外，书中还

⁴⁷ 吉野誠著，韩哲浩（音译）译，《东亚地区韩日关系二千年史（동아시아속의 한일 2 천년사）》，首尔：与书同行（意译），2005，p. 36。

⁴⁸ 《宋书·蛮夷列传》。

⁴⁹ 吉野誠 著，韩哲浩（音译）译，《东亚里的韩日关系二千年史（동아시아속의 한일 2 천년사）》，首尔：与书同行（意译），pp. 69-73。

⁵⁰ 《日本书纪·钦明天皇纪》。

⁵¹ （韩）李三星，“‘帝国’概念的古代起源”，《韩国政治学会报》，第 45 集 1 号(2011)，p. 24。

有日本曾在朝鲜半岛南部设立任那日本府，进行统治等记录，也有高句丽、百济等向日本进贡等内容，其中不少内容不为韩国史学家们所接受。

另外，隋朝时日本寄给中国的一封书函也引起历史学家们的争议。据说那是一封由统一了日本并依据律令建立古代国家的日本圣德太子在公元 607 年寄给隋炀帝的书函。函中写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⁵² 这是一个一直向中国进献朝贡的周边蛮夷小国，自称天子，并在戏弄中国皇帝的一种举动。他之所以敢如此作为，是因为当时高句丽与百济，和隋以及新罗站在另外一个对立面相对峙，在这种国际秩序中，倭王才敢对隋帝如此出言不逊，而对此，隋炀帝却因担心高句丽与倭联手，居然还派遣大规模使臣队伍前往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众所周知，隋当时的确没能轻易打赢高句丽，在此之后的几次大规模远征战中都被打败，最后导致元气大伤，王朝灭亡。

在朝鲜半岛上，围绕统一国家而出现的国际局势对日本的影响也非常之大。尤其在 660 年百济被唐朝—新罗联合军打败之后，也一直在进行抵抗，倭国支持百济的抵抗势力。但是，倭国起初的派遣 5000 援兵，后来增加的 2 万 7 千援兵，都在锦江被唐朝—新罗联合军打败，而全军覆没。之后，日本陷于混乱，它恐遭入侵，而向东部迁都于大津京。但是当高句丽也被唐朝—新罗联合军打败（668 年）之后，新罗和唐朝之间又出现了对峙状态，这样日本才获得了一点喘息的机会，免于灾难。在这过程中，七世纪末，倭改名为日本，倭王模仿中国皇帝改称天皇。

4. 结论

我们能够称之为国家的政治组织最初产生于中国。而在这一过程中统治者的称谓随着政治局势的转变而发生了变化。商的最高神称“帝”，最高统治者称“王”。当时的“王”字是一斧头的象形，这说明当时国王是建立在物理力量之上的一种概念，而非具有超越一切的权威。之后，周朝同时使用“王”与“天子”两种称号。天子意味天的儿子，而天是周的神，随之，“王”开始具有与天命相同的超越一切的权威。这与王权的进一步强化有着紧密的关系。于此同时，“帝”却被“天”替代，其地位降低，它处在天与人之间被用作称呼祖神。

春秋时期，周势力弱化，在诸侯国之间出现了以武力掌握中原秩序的统治者。他们被称为“霸”。“霸”被认为是在中原主要地区维持整合秩序的统治者或国家。但因为“霸”的统治是依靠权力和武力的。因此在儒家经典文献中，它要比起那些以德为本的“王”，地位偏低。不仅如此，“霸”多指地区性权威，而非指全国性、整体性的权力。战国中期以后，诸侯们先后称王，这是因为周的权威已不为诸侯所认可和接受。

⁵² 《隋書·東夷列傳》。

在秦国欲统一天下的情况下，“王”与“霸”等称谓已不适合秦王所用。“王”这一称呼已由各个诸侯使用，因此需要一个更高层次的称谓。“霸”也作为地区性、整合性概念并因带有非道德性意味，而不适用。这种状况下，既带有道德意味，又带有力量之意的概念，也就是“帝”了。因此，战国末期，秦就已经开始推进改称“帝”的事业。统一后，秦王对称谓进行了适当的变形，改称为皇帝。在中国历史上皇帝的登场，意味着在广大领土之上建立了中央集权制政治体系。

而在这种意义上，也许“皇帝”作为一统天下，其权威覆盖周边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这一称谓也许不太恰当。对于周边邻国，皇帝没有进行直接的统治，而只是在名义上主张其统治地位，那么从这一点来看，也许“天子”一词更适合这种体制。作为一种对策，也就是同时使用皇帝和天子这两个称谓。实际上也一直是这样做的。《礼记》记载，“君天下者曰天子”，⁵³ 对此，东汉文人郑玄曾指出：“天子，谓外及四海也。今汉于蛮夷称天子，于王侯称皇帝”，⁵⁴ 并做了注释。⁵⁵ 而在现实上，这两者并未被严格区别开来使用。

当时在中国周边也开始出现古代国家。尤其在西汉中期，因着武帝的对外征服战争，周围邻国与汉朝关系紧张。在朝鲜半岛附近出现了朝鲜、夫余、高句丽等古代国家，汉朝不仅直接对古朝鲜进行郡县化，还与夫余、高句丽等建立了朝贡册封关系，构建了皇帝—国王这种等级秩序。当时位居朝鲜半岛中南部的三韩以及倭（日本）的各个部落也并存鼎立，与他们汉朝主要是以边郡方式建立了册封体系。

在中国三国、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时期，一直与朝鲜半岛及其北方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古代国家鼎立。日本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统一的国家。中国(当中国分裂时，各个中原国家)与这些国家，以及各个周边国家之间建立了一定的政治秩序。这一过程中统治者的称号成为重要的国际政治问题。因为相关称号反映着国家（以及最高统治者）的国际政治地位。皇帝试图通过赐予邻国头领“王”或其他各种名称的官职或爵位等方式来建立一种君臣关系。

邻国头领进贡于皇帝，皇帝再赐予印绶，进行册封，这就是所谓的朝贡册封体制。而皇帝虽然在名义上居上位，但实际上他还是承认邻国自主的政治势力的。韩国古代国家（高句丽、百济、新罗）等都称为王，也自称为朕。日本天皇也是如此。而朕其实是秦始皇时用来称呼皇帝的或为皇帝的自称。中国国内的诸侯都不可称“朕”，这一点说明，在朝贡册封体制下，邻国的最高统治者在其国内是位居最高地位的，而且在进行独立自主的统治。

⁵³ 君天下曰天子。

⁵⁴ 天子，谓外及四海也。今汉于蛮夷称天子，于王侯称皇帝。《礼记正义》卷4，本文参考（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p.1260。

⁵⁵ 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乐浪郡徼，去其国万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韩国七千余里。其地大较在会稽东冶之东，与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

皇帝和邻国都是带着一定的目的来建立朝贡体制的。从皇帝的角度来说，朝贡册封制度在他不可能直接去统治周围不同民族及其疆域的情况下，可用它来贯彻他普世的统治理念。而在中国分裂的情况下，也可通过朝贡册封体制，建立同盟关系或相互支持的关系，进而在竞争国之间巩固和提高他作为皇帝的地位。而朝贡制度也被运用为一种以夷制夷的手段，用来巧妙利用周边国家之间的矛盾。

而从邻国的角度看，在他们与汉朝之间的非对称性权利结构中，通过承认和接受皇帝的权威，可获得一定的自主权，也可通过贸易以及赐予等方式来引进和运用汉朝较高的文明。那么从统治阶层的角度来看，可利用皇帝的权威并获得对外贸易的垄断权，也可进一步巩固其统治的正当性。中国周边国家称“王”意味着该地区已形成古代国家，并在进一步强化王权。

另外，因日本的特殊地位，古代东亚秩序呈现相当复杂的面貌。日本在早期历史上，一些小国接受了中国的册封。当然朝鲜半岛上的小国或倭国即便都归入了中国的秩序体系之内，但与中国不是不存在矛盾。这是因为朝贡制度，如上文所述，它被中国以及邻国运用在实现各自的各种目的之上。在这种情况下，各国为了在册封体制上占据优势一直都在进行竞争。而在日本，这种情况直至倭王改称天皇这一与皇帝称号相媲美的称谓之后，也依然持续。

总之，古代东亚社会最高统治者的称谓，一方面反映了朝贡体制的秩序和规定，一方面也较难完全按照字面意义来理解它。因为朝贡体制本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为实现各自的目的而灵活使用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说，其形式与现实存在不小的背离。